Vol.5 No.1 2025 Philosophy & Ideology Research
https://doi.org/10.37420/j.pir.2025.005

对平等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谢宝贵

贵州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运气平等主义和关系平等主义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两种主要的平等思想。前者声称，正义要求尽可能可能地消除运气给每个人的所得带来的不平等的影响。后者则主张平等的关键不在于分配的平等，而在于社会关系的平等。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这种平等思想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范畴来考虑平等与正义的问题，这导致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与不平等的根源的误判，进而还使得它们关于正义与平等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关键词：平等；平等主义；运气平等主义；关系平等主义；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贵州省 2020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公共福利制度困境下的道德辩护研究》（课题编号：20GZYB62）

A Marxist Critique of Egalitarianism

Baogui Xie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550025,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ogosxie@163.com

Abstract

Luck egalitarianism and relational egalitarianism represent two predominant schools of egalitarian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former claims that justice requires minimizing the unequal impact of luck on individuals' life outcomes. The latter contends that equality resides not in distributive patterns but in egalitarian social relations. However,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both approaches prove problematic: neither transcends the framework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when addressing equality and justice. This fundamental limitation leads to their misdiagnosis of the root causes of injustice and inequality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consequently rendering their conceptions of justice and equality untenable.

Keywords

equality; *egalitarianism*; *relational egalitarianism*; *luck egalitarianism*; *marxism*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在当今的政治哲学界，运气平等主义和关系平等主义无疑算得上是两种主流的平等主义正义观念。尽管它们都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但是所遵循的路线却大有不同。然而，不论是运气平等主义还是关系平等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它们的关注的焦点都过于狭隘且有失偏颇，都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人类平等和正义。

一、运气平等主义无法实现正义

运气平等主义的诸多论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如何让每个人获得的分配份额变得合理而展开的。运气平等主义的主要代表，比如德沃金(Dworkin)、阿尼森(Arneson)、柯恩(Cohen)、罗默(Roemer)，他们对平等的关切都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对某种东西获得分配上的平等，无论这种被分配的东西是“资源”（resource）、“（福利）机会（opportunity for welfare）(Arneson, 1989, 85-87)”还是“可及利益”（access to advantage）(Cohen, 1989, 916-941)。对于运气平等主义而言，这样的分配结果不但要消除单纯运气（brute luck）给人们带来的不平等的影响，而且从中还要能反映出每个人的选择。用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话来说，这样的分配结果一方面要“钝于禀赋”（endowment-insensitive），另一方面还要“敏于抱负”（ambition-sensitive）(Dworkin, 2000, 73－77) 。

运气平等主义对分配结果提出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其目的在于它想同时维护两种不同的价值：平等与责任。实际上来说，平等对运气平等主义来说基本上只是一种默认价值。这一点在特姆金（Larry Temkin）下面的这一主张中得到了非常简明的表述：“一些人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或选择）而过得比别人差，这是坏的——是不正义或不公平的”（Temkin, 1993,13）。在没有受到人们各自的选择或选项运气（option luck）[1]干扰以前，他们都应该过得一样好。如果有人具有先天性心脏病而过得比别人差，运气平等主义会认为这种不平等状况是由人们无法选择也无法控制的“单纯运气”造成的，是不符合分配正义的，应该予以纠正。比如，它可能会要求政府为他提供免费手术以恢复其健康。如若不能，则应当给予他持续的生活补贴以弥补他与身体正常的人们在健康上的不平等。然而，如果人们原本平等的生活状态是受到人们自己的选择的影响，那么由此可能在人们之间产生的平等就变得可被容许了。之所以容许这样的不平等存在，是为了让人们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毕竟，平等与责任这两种价值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相反，它们常常是相互冲突的。一旦它们发生冲突时，人们就只能从中被迫二选一，而不可能同时兼得。在面对平等与责任的冲突的时候，运气平等主义就会以正义的名义站在责任（不平等）这一边而非平等那一边。尽管它的这种选择让它自身显得有点名不副实。

当然，我们并不是想否认责任的价值，而是想指出，在只关注分配而不关注生产的情况下，责任作为负担也无法在人们之间得到公平的分配。因为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在现实社会中，运气平等主义会要求某些人不得不承担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某些不平等的责任。假设，张三与李四原本过得一样好。可后来，由于他们都参与炒股，张三把他的存款差不多亏完了，而李四却从股市中大挣

1 在某种意义上，“选项运气”可以归属到“选择”的概念当中，因为它根源于选择。本文中的“选择”都包含着选项运气的意思在里面。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了一笔。事到如今，张三与李四在生活上就变得不平等了：张三比李四要过多差很多。根据运气平等主义，现在他们在生活上不平等是由于他们各自的选择而造成的。尽管股票市场中存在着运气因素，但是它属于人们可避免的选项运气。也就是说，如果张三和李四选择不购买股票，他们就都可以免于这种选项运气的影响。因此，他们各自应该对由这种选项运气所带来的不平等的后果（无论对他们各自而言是好还是坏）负责。这样的不平等是他们应得的，而且也是正义。张三没有权利要求政府对他在股市中的损失进行补偿，更没有权利要求政府给予他补助从而可以使他现在可以过得与李四一样好。然而，我们对此却可以争辩说，虽然炒股及其后果是源于当初张三和李四各自做出的选择，但是，股票乃至整个证券交易制度却并不是他们进行选择的结果。这一整套制度在他们参与炒股之前早就存在了。如果一开始，他们所处的社会就没有股票交易这样的制度，那么他们后来也就无从选择炒股了，当然也就不会产生现在他们在生活上的不平等了。张三与李四生活在一个存在着股票交易制度的社会，这并不是他们各自选择的结果，正如他们各自出生在不同的家庭这样的事情也并非他们各自选择的结果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这都是缘于他们无从选择和控制的单纯运气而非选项运气的结果。由于单纯运气，张三和李四生活在一个早已存在股票交易制度的社会，然后，他们按照该制度的规则选择参与交易活动，并因此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不平等的结果，这是他们应得的吗？他们应该为这样的不平等负责吗？这样的不平等是正义的吗？对此，我们是表示怀疑的。然而，运气平等主义者会倾向于肯定的回答。他们可能会进行这样的回应：人们都是在包含着无数的、并非出于他们的选择而产生的自然事物与社会制度（文化）的背景下的进行选择的，人们不能因为他们做出选择的背景中包含有非选择（运气）的因素而拒绝对选择负责。否则的话，这会导致对选择与责任这本身的否定：本质上并不存在真正的选择与责任。我们当然不想否认选择与责任。我们主张的是，人们只应该对他们在公平正义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才是合理的。选择的背景的不正义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传递给选择及其结果。

的确，任何人在做选择之前，总是已经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中了，这不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他偶然碰上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为选择背景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没有好坏、正义和不正义之分。人们可能是在一个中国古代帝制社会中做选择，也可能是在成长于当代美国一个毒品泛滥的街区的社会背景下做出选择的，又可能是在一个贫富差距较小的、自由民主的当代北欧社会中进行选择的。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社会背景（不论大小）会对身处其中的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对不同人的选择可能是大的，也可能小的，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不难想象，中国古代帝制社会对其中的官僚阶层在进行选择方面往往是有利的，相反，它对其中的平民百姓在做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不利的。而且中国古代帝制对人们在选择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而重大的。因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所做的一切选择都只能在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所能允许的有限社会范围内进行。他们的选择基本上是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的。所以，无法想象，人们在中国古代帝制社会中进行人生规划时，会选择竞选总统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根本就没有给人们提供这样的选项。甚至可以断言，在中国古代帝制社会里生活的人们，其思想意识受到了如此严重的限制，以至于他们都不可能产生有关自由民主制度的任何想法。由于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本身的不正义性质不可避免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造成不公平、不正义的影响，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所以要求他们完全为各自的选择承担责任反而是不公平的。一般而言，要求人们为在坏的、不正义的或充满偶然性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负责，是不太合理、也不太公平的；要求他们为在好的、正义的或偶然性较低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负责，是比较合理和公平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要求生活在当今北欧社会的人们为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要比要求生活在中国古代帝制社会的人们为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相对而言显得更加合理和公平。

按照这一思路，就前面张三和李四的例子而言，要求他们为其选择承担全部的责任，就显得难以接受。尽管股票交易活动具有一定的可预知性，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充满着难以预测的偶然性。因此，这就意味着，他们选择进行炒股的背景制度（股票交易制度）本身就具有大量的偶然性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张三可能会想，他宁愿生活在一个没有股票交易制度的社会里面，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免受股票市场中偶然性的影响和诱惑，他们的利益也不会因此而受损或受益。在这样没有股票交易的社会里要比在有股票交易的社会里，人们的选择更加不受运气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就更能够为他们的选择负责，进而他们也更应该为他们的选择承担责任。相反，张三和李四实际身处的社会是存在股票交易制度的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他们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做的选择，相对而言，由于股票交易制度中运气因素的影响，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对他们的选择完全负责。

从以上的事例不难看出，如果缺乏公平正义的初始背景作为人们进行选择的前提，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选择就难以完全负责，因为初始背景中包含的非选择的不正义因素会影响人们后续的选择。倘若强行要求他们为这样的选择承担完全的责任，那么这显然与运气平等主义对个人责任的强调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也是不正义的。

那么什么样的状况才算公平正义的初始背景呢？德沃金与罗默在这方面的观点值得我们参考。德沃金作为当代运气平等主义的第一位系统阐述者，他在论述他的资源平等理论时的起点是一个荒岛上的幸存者们都拥有平等的初始收入（购买力）。没有这个前提，他的资源平等理论就无从展开(Dworkin, 2000, ch. 2)。而罗默则主张，不正义的剥削主要来自于生产资料在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要真正避免剥削、消除单纯运气对人们生活状况的不公平影响，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人们之间平等地分配生产资料（Roemer, 1982, ch. 7）。[1] 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的单纯运气的不同，导致他们出生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也各不相同。人们在出生时的这种不平等背景就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拥有不平等的资源与人生发展机会。这种背景的不平等对人们未来总体的生活的影响怎么高估都不过分。换句话说，没有哪种不平等比人们出生背景的不平等对他们总体生活的影响更深远的了。所以，运气平等主义如果真正想最大限度缩小单纯运气给人们造成的不应得的不平等的话，最重要的做法就是要尽可能地保证人们出生背景的平等。要保证人们出生背景的平等，关键在于保证人们在出生时拥有平等的生产资料。这也就是说，运气平等主义要真正实现它所追求的理想，重点应该放在保证人们从一开始就拥有平等的生产资料。就当下现实而言，每个人拥有平等的生产资料远比每个人拥有平等的天赋（不管是体力上的还是智力上的）对促进人们之间的平等要重要得多。设想，一个人出生在亿万富豪之家，天赋平庸，而另一个人出生在贫寒之家，天赋很高。这意味着这两个

1 德沃金所要求的人们在初始收入（购买力）上的平等本质上就相当于罗默所主张的人们的初始生产资料的平等。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人从一开始就拥有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和天赋，而且这种不平等往往会导致他们两个人以后在经济上的巨大不平等。然而，未来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出生在富豪之家的前者在经济上仍然要好于出生于贫寒之家的后者，哪怕后者的天赋要远高于前者。以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为例。谁敢说他们家族的财富主要是源于其成员要比同时代的多数美国人更有天赋呢？鉴于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社会的不平等主要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天赋上的差距才产生的，而主要是因为人们占有的生产资料不平等才导致的。因此，尽管人们出生时在天赋上的差异与在生产资料上的差异，都是单纯运气的产物，但就实际效果而言，消除初始人们在生产资料上的不平等，要比消除他们在天赋上的不平等更有助于实现运气平等主义的目标。因此，运气平等主义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生产资料的不平等之上，而不是热衷于讨论天赋、才能、选择、偏好对给人们带来的不平等。后面这些不平等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对人们的生活所蕴含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然而，如何实现生产资料的平等分配呢？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现实中，因为每个人都出生在财富各不相同的家庭，所以他们出生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也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人们在出生时都处于平等的生产资料的起跑线上，难道要把如今社会所有的、分配极为不平等的财富重新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吗？且不是说这种方案的可操作性有多低，就算我们能够解决可操作性问题，我们还是无法保证未来的每一个人出生时都拥有平等的财富（生产资料）。因为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的父母可能由于各自的选择而使他们原来拥有的与其他所有人都平等的财富发生变化。有些人的财富可能增加，而另一些人的财富可能减少，还有些人的财富可能保持不变。但无论这种财富的变化具体是怎么样，此时人们之间的财富又重新回归到不平等的状态，他们的后代因而在出在时也处在财富不平等的状态之中。但这种出生时的不平等对于这些后代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不是源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这种对后代的不公平是运气平等主义所没有考虑到的。哪怕是从德沃金所说免于嫉妒的初始资源平等出发，这种不公平依然无法避免。这是运气平等主义正义观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除此以外，运气平等主义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在不改变现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即便能保证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初始财富，也并不能保证人们后续的财富分配是正义的。因为正义不仅取决于从一开始人们是否拥有各种平等的机会，而且还取决于有机会参与的各种活动本身是否正义。一项活动是否正义，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规则是否正义。如果活动规则是不正义的，那么就会导致活动的结果是不正义的。而不正义的结果很难说是人们所应得的。例如，以参与者的器官作为赌注的赌博就难以说其结果是正义的，哪怕参与者都是自愿的，且具有平等的输赢机会，也同样如此。具体到当今世界而言，主流的生产活动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来展开的。根据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资本与劳动构成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是一条普遍规则。但这是一条不正义的规则。由于带有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即便人们一开始拥有大致相同财富，但最终仍然可能导致包含不正义的不平等的结果。有人会质疑说：何以可能呢？毕竟人们在财富上的起点是一样的，这意味着他们一开始拥有各种平等的人生机会。即便人们后来会产生财富上的不平等，那也是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与目标而导致的。这样的不平等应该谈不上有什么不正义才对。质疑者甚至会说，这样的不平等是人们所应得的。然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而，我们却不这样看。的确，即使在人们初始财富平等的情况下，他们的财富也会缘于他们后来各不相同的选择与追求而逐渐变得不平等。比如，尽管一开始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去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有的人把更多的钱花在休闲上，有的人更愿意努力工作或创业。可能过来一段时间之后，选择休闲的人，其财富会变得越来越少，而选择创业且成功的人，其财富可能变得越来越多。到此为止，如果这两类人所选择从事的活动都不包含剥削与被剥削的情况，那么这两类人之间在财富上业已产生的不平等就并不包含不正义的因素，因此也可以说是他们应得的。但是，这不是故事的全部。选择休闲的前一类人，在其财富逐渐变少到不足以维持他原来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往往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创业成功的后一类人。由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剥削也随之产生了。可想而知，在这种剥削之下，很可能这两类人在贫富差距上会越来越大。根据皮凯蒂的研究（Piketty，2014，244），资本所带来的财富集中远甚于劳动。至此，我们要追问的是，现在越来越大的不平等是正义的吗？这样的不平等都是这两类人应得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具有不正义的剥削性质的，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及其不平等的分配结果也具有不正义的性质。而不正义的不平等又怎能是人们应得的呢？

二、关系平等主义无法实现关系平等

出于对运气平等主义的不满，当代出现了另一种平等主义，即关系平等主义（relational egalitarianism）（Schemmel，2021，22）。后者对前者的不满在于，前者关注的重点没有放在真实的社会制度是如何不平等对待社会中的不同个人的，因此就无法说明社会制度是如何产生并维持人们在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的。前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何种分配模式是正义的。然而，关系平等主义则认为，重要的是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并非某种分配上或经济上的平等。但是地位平等当然也暗含着对分配的要求。比如，根据伊丽莎白·安德森的看法，要维持一个社会中平等公民身份，需要具有三个方面的条件（Anderson，1999，317）：作为一个人，要有维持生存、身心健康和行动等方面条件；作为一个生产合作体系的参与者，具有接受参与工作所需的教育的条件和职业选择的自由；作为一个民主政治的参与者，具有行使各种政治权利的必要条件。在关系平等主义者看来，人们在分配上的很多不平等主要是源于他们在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然而，关系平等并不保证人们在分配上一定是平等的。相反，某些平等是正当合理的，只要它们无损人们作为平等的社会合作者平等地交往与合作。由此也不难理解，运气平等主义者对源于单纯运气的不平等与源于个人选择的不平等这一区分的强调，在关系平等主义者那里就变得没那么重要。根据关系平等，即便是由个人选择而导致的不平等，只要它们会让某些人陷入一种不平等的支配性社会关系之中，那么这样的不平等也是需要纠正的，而不是像运气平等主义那样对它们放任不管。同理，倘若由单纯运气造成的不平等并不会使某些人处于一种不平等的支配性关系当中，关系平等主义并不会像运气平等主义那样要求一定要尽可能消除这样的不平等。对于关系平等主义者而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值得不值得关注和纠正，关键不在于它们是源于单纯运气还是个人选择，而在于它们是否会在人们之间形成某种支配性的关系。关系平等主义所主张的关系平等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人们之间的关系是非支配的。因为支配是一种严重的不正义，所以要实现人们之间的关系平等就应该尽可能地消除或减少人们之间的支配关系。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社会地位的平等则意味着，在作为合作体系的社会当中，人们是作为自由而平等的主体和参与者平等地进行互惠互利的交往与合作的。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的应该是一种无压迫与支配的关系。

关系平等主义对什么样的情形算是支配的解释，主要来源于共和主义。根据共和主义代表人物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对支配的定义（Pettit，2002，52），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构成支配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前者具有干涉后者的能力；2、干涉是任意的；3、干涉所涉及的是后者可以做出的选择。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支配关系中所蕴含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权力的不对称。因此，支配方的权力是缺乏与之对等权力对其进行制约的。正是由于支配蕴含着不对称的权力，才使得它备受关系平等主义的关注。关系平等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致力于消除人们之间的支配关系。我们自然而然能想到的典型的支配关系包括奴役、专制统治、强奸、霸凌、各种等级制（不论是性别的、种族的、种姓的、还是族群的）。这些极为严重支配关系无疑是关系平等主义首先要反对的。不过，这些系统性、制度化的支配关系至少在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不存在了。因此它们并不是关系平等主义者们的主要反对的目标。他们对某些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支配关系更为关切。例如，他们反对市场垄断，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垄断企业对相关行业的小企业或个人在某方面的支配。此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反对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这并不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本身就是人们之间的某种支配关系，而是因为某种程度的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会产生支配和政治不平等的风险（Schemmel，2021，233）。尽管作为关系平等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的克里斯蒂安·谢梅尔（Christian Schemmel）谈到了生产资料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上容易导致这部分人在政治上形成对他人的支配，但是他却没有讨论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在经济领域会直接导致更严重的剥削。

根据尼古拉斯·弗鲁萨利斯（Nicholas Vrousalis）的分析，剥削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支配（Vrousalis，2023，28）。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一种剥削关系，而且这种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外在表现就在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才使得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即支配成为可能。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剥削劳动这种系统性的支配形式毫无疑问要远比奴役、专制统治、霸凌、强奸和各种等级制这些支配形式更典型、更普遍和更突出。毕竟，后面这些支配形式至少在当代的民主国家中只是偶发性地出现，而并非系统性地存在。因此，倘若关系平等主义真的关心平等，它的当务之急就应该是竭尽所能去瓦解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然而，关系平等主义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这种最典型的、最突出的和最普遍的不平等的支配（剥削）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探讨，甚至鲜有关系平等主义者承认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剥削和支配关系。因而，也不难理解，关系平等主义对产生这种支配关系的重要前提——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等也缺乏反思与批判。这对于以追求平等关系为己任的关系平等主义而言，真可谓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三、马克思主义与平等

马克思对平等的态度是复杂的，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是赞成某些方面的平等的，但是他是非常反感资本主义的平等主义观念的，包括本文所讨论的运气平等主义与关系平等主义。

首先，从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他的某些观点是与运气平等主义的主张恰好是背道而驰的。在运气平等主义者的眼中，每个人天生的才能是各不相同的，人们在才能上的这种天然的不平等的分布是单纯运气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此外，人们不同的才能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能够给它们各自的所有者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并非人们选择的结果，也属于一种单纯运气。源于这两种单纯运气而在人们之间造成巨大的不平等的利益分配结果，这是运气平等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不正义。所以，他们会主张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不平等，应该实施某种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政策，从而让人们在收入与财富分配上变得更加平等。在推行运气平等主义的社会里，是不允许某些人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天才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而获得远超其他一般社会成员的收入和财富的。然而，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这种情况是被允许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个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还带有它刚从中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印记。所以这个社会所主张的平等的权利仍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权利。虽然“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很显然，马克思意识到了，所谓“平等的权利”并不能消除劳动者们因为天赋或客观处境的不同而带来的不平等的后果。例如，在同样的时间内，一个劳动者由于天生智力上的原因而比另一个劳动者能提供更多的劳动，因而能获得更多的消费金额。另外，获得相同的消费金额的两个人，由于一个没有结婚生育，而另一个已经结婚并育有小孩，他们前者的生活状况却要优于后者，因为前者并不需要养育小孩，而后者需要。尽管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存在这样的不平等，马克思却并不主张消除这样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并不是一个运气平等主义者。

那为什么马克思不赞成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消除运气平等主义所反对的不平等呢？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马克思强调的是前分配（pre-distribution），即生产，而并非运气平等主义所强调的分配与再分配（redistribution）。马克思认为，生产与分配并非是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联系的。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分配决定生产，但是它可以反过来影响生产。可以说，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决定了什么样的分配结果。按照这一思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分配的不平等是根源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而不是分配机制本身。相反，（再）分配机制本身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如果生产关系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那么分配的不平等也很难从根本上进行扭转，哪怕通过一系列的再分配措施也只能在较小的程度上减少这种不平等。然而，这并不是说，只要一开始每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平等的，就自动会产生一种持久平等的生产关系，而且之后社会产品的分配基本上也都是平等的，或者说不平等的程度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就算一开始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产资料，但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仅分配结果会由于各种因素（包括人们不同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平等，而且原本每个人拥有的平等的生产资料也会在持续的生产与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分配机制的作用下变得不平等，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集中和垄断。而这种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则又会加剧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如此一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就会陷入一种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避免分配结果出现巨大的不平等，最有效方式就是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造，把不平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转变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当生产资料自始至终不再属于某些个人而是归整个社会所有时，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才可能最大限度地被限制。比如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情况下，即便允许由人们在天赋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分配结果上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不关键的和短暂的，因为它远不足以造成阶级的分化。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权利凭借资本而获得社会产品的分配的。更准确地说，在这样的社会里，资本赖以存在的前提都消失了，因此想凭借资本而获利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为何如此呢？因为此时人们不再是为了利润而生产，而是为了使用价值本身而生产。更何况，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人们享有各种社会福利，包括教育、保健、养老等。这些福利是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提供给所有社会成员的。它们源于对人们劳动所得的扣除，但最终又返还给全体社会成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运气平等主义虽然主张用再分配的方式尽可能消除运气给人们带来的不平等的影响，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废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作为巨大不平等鸿沟的阶级就依然会产生和持续存在。

其次，目前主流的关系平等主义也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关系平等主义的理想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法真正实现的。马克思显然并不反对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性别等方面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马克思当然也反对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之中。虽然马克思也会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形式相对于之前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支配形式而言没有那么血腥和严酷，但是它与前两者一样，依然是一个存在着巨大压迫与剥削的阶级社会，即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广大无产阶级的社会。而只要还存在阶级及其剥削和压迫，那么在这样的阶级社会里，人们就不可能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性别等方面形成真正的平等关系。当代的关系平等主义强调的是反对不平等的支配关系的现象，却没有致力于去批判和摧毁导致不平等支配关系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这个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源的现实表现就是阶级差别。从阶级差别中又催生出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像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社会地位不平等，诸如此类。因此，想要实现真正的关系平等，就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公有制，从而消除阶级差别。“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哥达纲领批判》，1995，311）。”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参考文献：

[1]Anderson, E. (1999).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109, 2.
[2]Arneson, R. (1989). “Equality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Philosophical Studies, 56, 1.
[3]Cohen, G. A. (1989). “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Ethics, 99, 4.
[4]Dworkin, R. (2000). Sovereign virtu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哥达纲领批判》，1995。
[6]Pettit, P. (2002). Republica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Pin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8]Roemer, J.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Schemmel, C. (2021). Justice and Egalitarian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Vrousalis, N. (2023). Exploitation as Dom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